

如何文学评论更有力量

真凭实据地探究文学的秘密

□ 赵海菱

1944年春天,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傅雷在《万象》杂志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鞭辟入里的评论。在分析《金锁记》时,他对其人刻画之入木三分、意境营造之出神入化、语言技巧之鬼斧神工等都予以激赏,认为这部作品“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同时,傅雷对正在《万象》连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彻底否定,认为无论内容还是语言风格,皆流于恶俗,预言这部作品“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正告作者务必爱惜自己的才华,严肃创作态度。

年少气盛的张爱玲对傅雷的耳提面命大不以为然,写了《自己的文章》聊作回应。晚年的她翻阅《连环套》羞愧难当,坦言“尽管自以为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发笑”。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傅雷的这篇评论文章,感觉仍不失为一篇见解不凡、文采斐然的妙文,给人以以艺高人胆大、赤诚相见的鲜明印象。我们依然期待这样“有力量”的文学评论文章。

对好作品“叫好”也是有力量

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为文学之双翼,是一种相互砥砺、并驾齐驱的关系。但很长时间以来,文学评论似乎只会说“好话”了。并非文学评论不能褒扬,也并非文学评论必须吹毛求疵,这里所说的“好话”,实际上指的是那种“强将笑语供主人”式的言不由衷的“好话”,或是那种“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式的人云亦云的“好话”,或是那种“皇帝的新衣”式的自欺欺人的“好话”。

假如文学作品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又何尝不可以拍手称赞、逢人说项呢?这种毫无保留的“叫好”,同样亦是“有力量”的评论,而且意义重大。

1958年3月,茹志鹃在《延河》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以灵妙的笔写残酷的战争题材,讲究铺垫与神韵,讲究留白与象征,与当时流行的英雄书写风格迥异,却令人内

心深受震撼。

茅盾慧眼识金,读后立即为之撰写精彩评论,通篇都是赞誉。《百合花》得以转载于当年《人民文学》第6期,赢得好评如潮,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设若当年没有茅盾的披沙拣金和着意推举,《百合花》销声匿迹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之中,恐怕是极有可能的。

培养优异的审美直觉和悟性

识人贤否不易,道作品长短亦难。好的评论家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出色的理性思辨能力,更要有优异的审美直觉和悟性。二者兼具,方能对作品的内涵进行精辟阐发,方能对作品的得失作出令人信服的评判,并提出中肯的建议。刘勰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操千曲”与“观千剑”,意味着长期不懈地流连于古今中外文学原创经典,孜孜不倦地含英咀华。

应该说,诗乃一切文学之核心。无垠的想象,极致的抽象、神秘的哲理,最是集中于诗中。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是诗性的充分呈现,《红楼梦》《阿Q正传》《雷雨》《哈姆雷特》《堂吉珂德》《局外人》《老人与海》《边城》……我国自古就是诗之王国,天人合一观念始终统摄着文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象思维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看家本事。要加倍增强审美感知能力,必须多读诗,多读诗性之作。

中国古代的诗话,对培养审美眼光尤为得力。而西方深刻的文艺理论著作,则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理性思辨能力,深化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并启迪我们找到恰当的研究视角与学术路径。

有生命力的文学评论,建立在真切而深刻的审美感受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只是冷冰冰的就事论事,干巴巴的逻辑推理。评论家首先应该从文学作品中体验到一种超乎寻常的生命感动和灵魂震撼,引发深入思考,然后才去抽绎和总结隐含其中的某些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少学者发现,将西方现代人文社科理论应用于我国的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打开思路、拓宽视野、构建



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被茅盾撰写评论推荐后,成为广受欢迎的作品。图为1981年出版的连环画版《百合花》。

新的学术体系颇有裨益,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对文学作品缺乏真切生动的审美体验与感悟,文章写得生硬艰涩,了无生气,让人难以卒读。

好的文学评论要开拓创新、持论有据

文学评论界少浮躁之音,多好好之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近来一段时间专家学者已从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究和反思,此不复论。除此之外,大概还有“温良恭俭让”传统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长期接受这样的心理暗示,在评价作家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收敛起自己的直性和锋芒,谦恭自持,温敦敦厚,只关注好的、有价值的地方,忽略差的、有缺陷的方面,以免伤人自尊,从而规避可能引发的麻烦与争执。“礼之用,和为贵。”为了“和”而按下内心的种种“不同”。顾忌多多,思维势必受到局限,研究思路就易于循规蹈

矩,难以创新,难以出彩。

事实上,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它就成为一个独立而客观的存在。评论家有必要抛开世俗的私心杂念,依照自己的认知与体悟,对作品的价值进行阐发。唯有这样,他才能有新发现、新收获,评论才能有的放矢,发挥实效。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需要一种为求真理无私无畏的勇气,褒贬出自公道,推论源自真凭实据。评论家也务必坚守学术良知,把研讨限定在文学的界域之内,秉持公道心与同理心,持论有据。作家最要紧的是拥有一颗平常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进行文学评论,再三再四的文本细读自然必不可少,而评论者与作者双方的沟通交流亦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彼此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对作者而言,通过这种推心置腹的交流对话,他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幽微角落或潜意识层面,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对自己作品的结构设置、推进节奏、语言技巧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常常会有不期而遇的顿悟。对评论者

来说,则会因这种智慧的碰撞而灵光四射,发现新的研究切入点、打开新的研究界面。

研究已经过世的作家,各种史料诸如作家本人的谈话、日记、亲友回忆录、作家年谱等,有必要加以细心研读。路遥自传色彩很浓的小说《人生》,读者不约而同地认为小说中男主角的原型是作家本人,而对书中女主角巧珍的原型则很少追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评论家程彤《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一文,通过对路遥生平各种史料的深入分析,认为巧珍的原型为村支书刘俊宽女儿刘凤梅,路遥初恋女友林红、妻子林达等多位女性的投射,亦有路遥自身的影子——面对文化心理强势的北京知青,路遥在恋爱、婚姻关系中始终是十分软弱和自卑的,其本人在彼此交往、相处过程中所体验到种种酸涩痛苦,都为他写活善良、痴情、怯懦的巧珍这一农村女孩形象注入了养分,“路遥在巧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困守乡下无法施展的制度性障碍”。这就超越个人层面,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

发展进程具有多重关联。这样的视角对研究其他作家的创作心理亦很有启发。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和技巧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的进步。”这段话也适用于文学评论,只不过解决科学问题需要数据分析,而解决文学问题则需要史料支撑而已。

文学创作,需要才情、学力和呕心沥血的忘我投入,方能有所建树;文学批评,相比之下对理性思辨能力的要求更高一些,需要在类比分析和逻辑推理方面多下功夫,但同样也和作家一样,需要“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博览群书,取精用宏,有开阔的视野,有深刻的洞察力,有敏锐的判断力。唯其如此,面对文学作品时,方能独具只眼,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并能左右逢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学院教授)

写给普通劳动者的精神颂歌

□ 王宏图

长篇小说《山河人间》读后

陈家桥长篇小说《山河人间》(花城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聚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安徽六安老区人民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兴建溧史杭水利工程的历程。小说翔翔如生展现了程志刚一家五兄妹修建水利工程时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汗水,讴歌了普通劳动者忘我的献身精神,而主人公农民英雄程志茂也成为近期文学创作中一个鲜明形象。

全书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程志刚的大哥程志茂。他是那个激情如火年代中的英雄,有“干不死”“白化手”“洼刀腿”等外号。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半个世纪前人们的生活情形和精神状态。作者通过塑造程志茂这一形象,提供了那个激情年代中的一个典型样本。他身上蕴藏着那个年代千千万万民众建设新中国、改造大自然、创造美好新生活的豪情壮志。作为力图摹写20世纪中国历史全景的“时代三部曲”中的一部,《山河人间》通过对程志茂等人以及乡村社会各色人等的细腻展现,让人们沉浸在那个年代特有的回音之中。

书中的程志刚算不上主要人物,但他与程志茂的兄弟关系,以及他对英雄哥哥的了解,旁人难以企及,使程志刚隐秘的成长史成为整部作品中一条重要的支线。全书伊始,他刚从农校毕业,暂时去乡社当社员,投身水利工程建设。他当时的心境实在忐忑,由于不擅长做抓活的体力活,一时颇感迷茫,对个人的未来发展也颇有疑虑。革命家庭出身的李义兰谆谆劝导,使他慢慢意识到自己的缺陷与不足,而大哥程志茂的言传身教更激励他勤奋拼搏。在全书结尾处他领悟到,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拥有双手,“我们就可以劳动,大象用鼻子都可以卷东西,人用双手可以抱得更牢,抱得更紧”。正是在大哥的感召下,程志刚慢慢成熟起来,从个人的小圈子跳出来,融入到火热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河人间》又是一部年轻人艰难成长的心灵史。

这部近40万字的小说从头至尾是由百余封信连接而成。在快捷便利的即时通讯成为人们沟通交流方式的今天,书信已近乎绝迹。而在20世纪60年代,书信还是人们礼尚往来的重要工具。陈家桥在叙述手法上延续了其一贯的精致和考究,通过书信体来推动故事的讲述。程志刚和李义兰这对青年男女,原本是农校同学,毕业后一同参加了六安地区规模浩大的水利建设工程。他们通信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信件篇幅洋洋洒洒,事无巨细,娓娓道来,即便是较短的信也有千把字,与今日的微信短消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谈各自的工作、生活与理想憧憬,渐渐发展成一种对亲密伴侣的牵挂。

纵观中外文学史,书信体小说最适合于展示人物细腻复杂、变幻不定的内心世界,卢梭《新爱洛绮斯》、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堪称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在陈家桥的这部新作中,由于情窦初开,由于各自的矜持和羞怯,程志刚和李义兰几乎没有感情的直接倾诉,文字只能在字里行间捕捉到蛛丝马迹,这也许正是陈家桥的用意,用文字唤醒历史。

这部小说虽然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故事,但它将人物置于百年历史巨变的整体框架,从而赋予这些人物浓重的历史感,从中可以感悟到普通劳动者的朴素与伟大。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对信仰之光的深刻洞悉与呈现

——读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

□ 李云雷

郑欣的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描写了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与研究的年轻人,面对时代变革经历的人生选择,表达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和坚忍顽强的民族精神。

故事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繁花似锦的北京城里,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孟敏之和表姐顾惠茗,分别于北洋军阀唐氏家族的两人兄弟唐淳祐,唐淳祐定下姻缘。正当这两对少年情侣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时,唐氏家族却平地风云,卷入一场风波,两兄弟不得不踏上新的的人生道路。唐淳祐长途跋涉进入黄埔军校,加入国民党,而唐淳祐则去山东青岛散发传单,领导工人运动。大浪淘沙后,唐淳祐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成为艰苦岁月的中流砥柱,经过多年的斗争,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他们也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小说的开头颇有《红楼梦》的韵味:“初冬昏黄的夕阳,映照三希堂青莲诗文铭白羊脂玉方盘,油润温沙,酥酪一般细腻。十七岁的惠茗就着表妹之手,认真地端详着,一双凤目微微地眯了起来。几行铭文细致如她,她一手拿了一方豆青细帕,不由得就接过来,想看一底部:‘三希堂制’几个小字。敏之笑道:‘仔细这壶润滑得紧。’一句未落,方壶就从细帕中滑了下去,跌在惠茗脚下。”这里的器

物、色泽、语言的感觉,以及说话的语调,似乎都是从《红楼梦》中化用而来的,但又与她们的身份符合。小说多从女性视角展开叙事,关注“人生安稳的一面”,对世道人心和人情世故的深刻洞悉与呈现,以及苍茫而又细腻叙述风格,都让我们看到《红楼梦》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小说在题材上并不只关注家庭生活,而是以淳祐、淳祐两兄弟的人生选择为中心,将诸多重要事件纳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淳祐、罗丹、黎达泽、肖禾、陈尔留、黎春花等共产党员的出现,为人物命运带来了曙光和希望。小说中的黎达泽和肖禾分别是以李大钊和邓恩铭为原型塑造的,他们在小说中出场并不多,但黎达泽的思想启蒙和肖禾在青岛领导工人罢工的实际行动,对淳祐、罗丹走向革命道路起到了决定作用。

淳祐是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翻译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共产党宣言》,是淳祐被捕后对父亲辩解:“我英文好,罗丹和黎达泽两个人烦我翻译一篇英译德文的稿子,说是一个叫什么马克思的德国人写的宣言,我才看了两行字,就被稀里糊涂地带走了。”第二次出现,是读书会上淳祐不解为什么又要重新核对原文,一位长衫戴眼镜的青年说:“因为那一句未落,方壶就从细帕中滑了下去,跌在惠茗脚下。”这里的器

是德语英语相差甚远,只有欧罗巴的语言才可以相类近似。黎达泽同志从伦敦带来了英文版,我们就得比对一下。”第三次出现,是肖禾向青岛的工友介绍淳祐:“黎达泽同志生前都很器重他,这洞悉与呈现,以及苍茫而又细腻叙述风格,都让我们看到《红楼梦》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淳祐在《共产党宣言》的早期翻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也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小说中的罗丹也是一个奇女子,她热烈大胆,勇于追求真理,数次身陷囹圄,在狱中与淳祐萌发了情感并走到了一起,最后她牺牲在抵抗日军扫荡的前线,短暂的生命放射出无穷的光彩。这些叙述的循环,让我们看到了新力量与新生活。

整部小说如行云流水,将诸多历史事件与淳祐、淳祐的人生相交织,既有来自《红楼梦》的独特韵味,也有建党初期的奋斗牺牲,呈现出了一幅斑斓多彩的历史画面。但小说仍留有一些遗憾。比如篇幅较短,有些部分未能充分展开。而且有的历史事件,没有充分转化为小说的叙述,其中在颇为精彩的聊城保卫战中,就被稀里糊涂地带走了。”第二次出现,是读书会上淳祐不解为什么又要重新核对原文,一位长衫戴眼镜的青年说:“因为那一句未落,方壶就从细帕中滑了下去,跌在惠茗脚下。”这里的器

(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文学评论家)

以文字为英雄塑像

——读长篇小说《十一中队》

□ 周百义

樊希安的长篇小说《十一中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用生动的笔触,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一批特殊岗位上的英雄,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小说中所描写的“十一中队”,是20世纪70年代根据国防建设需要而组建的基建工程部队兵部队。这支部队肩负特殊使命,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承担繁重险重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十一中队》中写到的这支按照军队编制组建的基建工程兵队伍,主要在大漠边缘嘉峪关外的镜铁山中,为酒泉钢铁公司建设矿山,提供矿石。十一中队官兵将海拔5000多米的镜铁山作为驰骋的战场,来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他们主要负责承担矿山建设中你最艰苦、最危险,也是工程技术含量最高的竖井、天井、斜井和平巷的开凿任务。这群主要来自农村的战士,在空气稀薄、气候寒冷的镜铁山中,每天轮流下井作业,用战士们自己总结的顺口溜形容,就是:“上班一身水,下班一身冰,走路吱吱响,像个铁甲兵。”巷道里工程地质情况复杂,不时会出现塌方、冒顶、残炮、盲炮、断钎、透水、泥石流、矿车掉道等多种不安全因素。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战士们一个月才拿几元津贴费。但是,这支亦工亦兵的特殊队伍,继承了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苦和累且不说,就是面临牺牲也毫不畏惧。在一次运输罐笼坠落事故中,11名战士全部牺牲。虽然坠井事故让幸存的战士感到悲痛和恐惧,但他们无一退却,

继续奋战在矿洞深处。

奉献和牺牲,是这批基建工程兵战士共同的主色调。作者还写出了每一位英雄共性中的个性,描绘出属于那个时代色彩斑斓的风景。因为那批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经历、学历和性格禀赋的战士走到一起,在工作和成长的道路上,必然会产生一些碰撞。作者在描写部队军事训练和开矿开掘的同时,着重写出这批官兵在工作生活中的不同追求,呈现了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刻画了一批伟大而平凡英雄形象。小说中十几位栩栩如生的英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代理指导员王永学、中队长牛幸娃,“工改兵”工程师金昌浩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后参加部队的指战员;一类是抗美援朝老兵“老霍头”,老红军夏玉龙等一批曾经在战火中淬炼过的老战士;一类是女军医苗丽萍、护士杨玉琼等年轻的女兵。在这些人中,王永学与牛幸娃是贯穿故事始终的中心人物。他们都是来自农村的青年,把参军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机会。王永学参军前已有初中学历,有思想,有辨别力,善解人意,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而作为孤儿的牛幸娃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参军后吃苦耐劳、敢打敢拼。他们你追我赶,相互竞争,共同进步。之间虽然有误会、有冲突,但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最终成为坚毅、果敢、成熟的优秀指挥员。小说还写了一批让人读后难以忘怀的普通战士,如“铁匠”苏明远,“理发匠”王玉波,“编织匠”慕古秀,“机灵鬼”申力

明等。作者通过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挖掘出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在十一中队的英雄群像中,苗丽萍等几位女性的形象尤其富有色彩。她们的身上不仅蕴含着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而且因为她们的人性光芒让寒冷的镜铁山涌动着生命活力。大学毕业的女军医苗丽萍飒爽英姿、敢爱敢恨,她主动要求来到镜铁山矿区当医生,“要陪伴牺牲的姐姐和重情义的老金”。朝鲜族工程师金昌浩是苗丽萍姐姐苗淑娟的男友,姐姐为探矿牺牲在镜铁山时,苗丽萍只有7岁,是金昌浩将她带大并领进了部队。但金昌浩多灾多难了她的表白,担心被人误会。历尽波折,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之间高尚的情操和纯洁的爱情,让整个故事充满了诗意的光辉。让一个故事充满了诗意的光辉。让一个故事充满了诗意的光辉。让一个故事充满了诗意的光辉。让一个故事充满了诗意的光辉。让一个故事充满了诗意的光辉。

对于笔下的这些人,樊希安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他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书写和塑造,以文字为英雄塑像,从而使得人物个性突出、形象丰富饱满,作品始终充盈着英雄的气概和精神的气息,不断给人心灵的震撼。(作者系长江文艺出版社原社长)